

文学传播学论稿 下

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

◆
王运涛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学传播学论稿 ②

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



王运涛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传播学论稿 (下) / 王运涛著.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1

(博士文库)

ISBN 7-80626-866-9

I. 文... II. 王...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1706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

作 者: 王运涛

出 版
发 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辽宁省实验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5 万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80 元

ISBN 7-80626-866-9/G·440

邮政编码: 130021

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

序

从 2001 年起我就想写一部著作专门研究文学传播: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研究领域,为创建文学传播学奠定基础。这样的计划和学术“理想”终于在今年付诸了现实。更可喜的是,现在不仅是我自己,就连我的学生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已经卓有成效。在给运涛同学这部专著写序之际,我带着极愉快的心情,把我关于创建文学传播学学科最早的一些思考和学术尝试写出来,既作为这本书的序言,更作为向学术界征询意见的请求。

—

国内传播学研究已完成从介绍、消化西方传播学向探讨、建立我国自己传播学的嬗变,拓展出许多传播学分支领域,但文学传播研究尚属空白。

1980 年以来,我国大陆传播学发展大体经过两个阶段: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引进、评析和理论探讨、应用研究阶段。该阶段以陈亮、陈韵昭翻译《传播学起源》为起点,开始系统介绍传播学在美国产生与演变情况及主要观点和流派,引起国内高校和部分新闻单位注意,引发相关的评价和分析。嗣后,出现探讨建立我国传播学理论体系和模式的趋势,逐渐将传播学研究推向理论探讨层面,代表性成果是 1986 年黄山传播学会议的部分会议论文。同时,以运用西方传

代，屈原所写的《九章》、《九歌》等作品也都是可以歌唱的祭祀文学。以比乐弦歌方式来传播文学，到汉代以后主要凭借“乐府”这一国家机关来实现，再到后来时代，就逐渐发展出词、诸宫调、杂剧和南戏等专门靠比乐弦歌来传播的文学样式。如宋代柳永所创作的词就主要通过唱来传播，即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而苏轼创作的“大江东去”一类豪放风格的词据说应该由关西大汉执铁绰板来唱。

(2)行吟与吟游。限于发表和传播媒介条件及传播技术水平，古代文学在先秦时代往往通过作者自己进行传播，行吟便是主要方式之一。当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用的就是“行吟泽畔”方式。此种方式似可更上推到孔子时代，《论语》所记的“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是这一形式；该书另一章所写的“楚狂接舆歌而过孔丘”也属此类。行吟作为传播方式到后来演化为诗人在游历中以文学来发布自己的感受，这种方式可称为吟游。唐代李白的大多数诗就是通过该方式传播的。他“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少年时代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此过程中，他写了不少壮丽的诗篇并通过吟游以发表；杜甫的许多诗篇也是在其游历中发布的。这甚至从有些诗的命名上即可见出：如《三吏三别》、《羌村》、《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与李、杜大约同时，唐代还有一个壮游塞外的诗人群落，他们以诗歌咏唱边塞风光、军中苦寒和个人壮志，形成其时的边塞诗派。该派绝大多数作品，也是通过吟游进行传播的。

(3)游仙与隐逸。这是与吟游近似的传播方式，其区别在于：吟游是在暂时性旅游或游历中发表诗文，而游仙和隐逸则是在相对长三吏三别》、《羌村》、《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与李、杜大约同时，唐代还有一个壮游塞外的诗人群落，他们以诗歌咏唱边塞风光、军中苦寒和个人壮志，形成其时的边塞诗派。该派绝大多数作品，也是通过吟游进行传播的。

(3)游仙与隐逸。这是与吟游近似的传播方式,其区别在于:吟游是在暂时性旅游或游历中发表诗文,而游仙和隐逸则是在相对长时间居留中发表文学。两者性质相同而历时久暂时不同,尤其是游、隐于山水的作家,因为他们主要采取吟游方式,虽少行吟之“行”,但“吟”却是一样的。山水诗、游仙诗,以及田园诗和咏怀诗是这一传播方式下的文学成果。谢灵运、谢眺可视为此方面的佼佼者。以游仙和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成果更为卓著,但是,西方的传播学主要是新闻传播、大众传播、全球传播和网络传播研究,而文学传播研究作为传播学分支仍未建立,研究著述也极少见。易言之,在国外,文学传播研究亦为空白领域。

从目前传播学领域的开拓状况,以及诸多传播学分支研究的进展看,以文学传播研究为方向 and 目标的文学传播学,是可以作为传播学分支学科而存在并有极广阔的学术前景。

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都堪称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学传播学尚为空白领域的学术背景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实具重大意义——既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独特学术领域,又为建设文学传播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这一具体领域的研究成果,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研究领域。此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代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还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

二

从目前传播学研究现状和业已积累了一定研究成果的历史传播

学、教育传播学、健康传播学,以及趋于成熟的新闻传播学经验看,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似应该遵从以下思路:

1.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以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指导,采取文献整理方法,以历史时间顺序为线索,按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思想、传播类型等类项分别收集、整理和编纂古代部分是用作郊庙祭祀的,在其演唱过程中也是要配乐的。到了战国时代,屈原所写的《九章》、《九歌》等作品也都是可以歌唱的祭祀文学。以比乐弦歌方式来传播文学,到汉代以后主要凭借“乐府”这一国家机关来实现,再到后来时代,就逐渐发展出词、诸宫调、杂剧和南戏等专门靠比乐弦歌来传播的文学样式。如宋代柳永所创作的词就主要通过唱来传播,即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而苏轼创作的“大江东去”一类豪放风格的词据说应该由关西大汉执铁绰板来唱。

(2)行吟与吟游。限于发表和传播媒介条件及传播技术水平,古代文学在先秦时代往往通过作者自己进行传播,行吟便是主要方式之一。当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用的就是“行吟泽畔”方式。此种方式似可更上推到孔子时代,《论语》所记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是这一形式;该书另一章所写的“楚狂接舆歌而过孔丘”也属此类。行吟作为传播方式到后来演化为诗人在游历中以文学来发布自己的感受,这种方式可称为吟游。唐代李白的大多数诗就是通过该方式传播的。他“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少年时代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此过程中,他写了不少壮丽的诗篇并通过吟游以发表;杜甫的许多诗篇也是在其游历中发布的。这甚至从有些诗的命名上即可见出:如《三吏三别》、《羌村》、《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与李、杜大约同时,唐代还有一个壮游塞外的诗人群落,他们以诗歌咏唱边塞风光、军中苦寒和个人壮志,形成其时的边塞诗派。该派绝大多数作品,也是通过吟游进行传播的。

(3)游仙与隐逸。这是与吟游近似的传播方式,其区别在于:吟播学研究成果更为卓著,但是,西方的传播学主要是新闻传播、大众传播、全球传播和网络传播研究,而文学传播研究作为传播学分支仍未建立,研究著述也极少见。易言之,在国外,文学传播研究亦为空白乎礼仪者”、颜渊“发歌商颂”等。此外,“诗三百”中的颂诗也有一部分是用作郊庙祭祀的,在其演唱过程中也是要配乐的。到了战国时代,屈原所写的《九章》、《九歌》等作品也都是可以歌唱的祭祀文学。以比乐弦歌方式来传播文学,到汉代以后主要凭借“乐府”这一国家机关来实现,再到后来时代,就逐渐发展出词、诸宫调、杂剧和南戏等专门靠比乐弦歌来传播的文学样式。如宋代柳永所创作的词就主要通过唱来传播,即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而苏轼创作的“大江东去”一类豪放风格的词据说应该由关西大汉执铁绰板来唱。

(2)行吟与吟游。限于发表和传播媒介条件及传播技术水平,古代文学在先秦时代往往通过作者自己进行传播,行吟便是主要方式之一。当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用的就是“行吟泽畔”方式。此种方式似可更上推到孔子时代,《论语》所记的“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是这一形式;该书另一章所写的“楚狂接舆歌而过孔丘”也属此类。行吟作为传播方式到后来演化为诗人在游历中以文学来发布自己的感受,这种方式可称为吟游。唐代李白的大多数诗就是通过该方式传播的。他“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少年时代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此过程中,他写了不少壮丽的诗篇并通过吟游以发表;杜甫的许多诗篇也是在其游历中发布的。这甚至从有些诗的命名上即可见出:如《三吏三别》、《羌村》、《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与李、杜大约同时,唐代还有一个壮游塞外的诗人群落,他们以诗歌咏唱边塞风光、军中苦寒和个人壮志,形成其时的边塞诗派。该派绝大多数作品,也是通过吟游进行传播的。

(3)游仙与隐逸。这是与吟游近似的传播方式,其区别在于:吟游是在暂时性旅游或游历中发表诗文,而游仙和隐逸则是在相对长时间居留中发表文学。两者性质相同而历时久暂时不同,尤其是游、隐于山水的作家,因为他们主要采取吟游方式,虽少行吟之“行”,但“吟”却是一样的。山水诗、游仙诗,以及田园诗和咏怀诗是这一传播方式下的文学成果。谢灵运、谢朓可视为此方面的佼佼者。以游仙和隐逸而传播的文学大多是游仙诗、山水诗和田园诗,但如果就作家的主观动机而言,这些游仙诗和田园诗又都是作家的咏怀诗。在古代中国,游仙的表现比较单纯,而隐逸却相对复杂。后者可以分为身隐,即穴居岩处,以及市隐和吏隐,即隐于朝市。如果隐逸者是诗人,则传播的文学是游仙诗、山水诗或田园诗;而市隐和吏隐的诗人所传播的文学则主要是咏怀诗。前者的代表性作家是孔稚圭、郭璞、吴筠,后者则以明代的顾麟和唐伯虎为典型。

(4)聚徒讲学与周游列国。这主要是散文传播所凭借的方式。与“诗三百”以比乐方式传播的同时,中国古代散文的传播是以聚徒讲学和周游列国方式进行着。春秋战国之际,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为发布和传播自己对当时社会和改革的意见,大多采取聚徒讲学或周游列国的方式,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其中的代表,其中孔子和墨子更为突出。孔子“有教无类”地广收学生,形成“弟子三千”的规模,墨子也聚集了“三百之众”,而在周游列国方面,他们都常常不辞辛苦地东奔西走——“孔席不暖,墨突不黑。”在此种艰苦的努力之下,他们围绕着诸如“克己复礼”、“兼爱非攻”和“仁政”写成的文学性散文得以散布和流传。如果说周游列国与行吟方式的共同遗传,造成了后来的吟游;聚徒讲学则是拓展出一个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它们都共同地为后来的文学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5)谏诤与酬唱。前者是封建社会臣子对于君主所应履行的一项任务,后者则是封建社会君臣、士大夫间交际手段之一。但在中国

古代,它们也作为散文和诗歌的传播方式表现出来。早在“诗三百”时代,士大夫就曾以诗谏诤,到汉代则是以赋以文谏诤。西汉那些“劝百讽一”的大赋和政论文都是这种谏诤的文学结果;唐代士人多以诗和表谏诤。白居易的《秦中吟》、韩愈的《谏迎佛骨表》是其代表,宋代人则擅长以论文来做这件事。谏诤的行为虽止于君臣间,但作为谏诤意见载体的文章或诗歌的传播却不止于这个范围。好的谏诤文辞,其传播是相当广泛的,并不仅限在当朝,甚至传唱千古,如李斯的《谏逐客疏》。酬唱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方式也源远流长,但其兴盛却是在南朝。其时君臣多在文学方面有所遇合,诗文酬唱也就增多,“宫体诗”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后来酬唱双方由君臣降至王公贵族,再后来更进到平民百姓,因相互酬唱而传播的文学作品也就难以计数了。仅以王公贵族、士大夫的文学酬唱为例,就有“三曹七子”、“竹林七贤”、“元白”、“李杜”、“二十四友”、“竟陵八友”、“永嘉四灵”等文学方面的唱和群体;而因为这种酬唱所产生的文学流派也为数甚多。

(6) 传抄与印刷。前者是后者的原始方式,而后者是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的新传播方式。它出现于宋元,至明代而大盛。文学在传抄中获得传播自不待言,当年秦始皇“焚百家之言”所烧的书大多是传抄的作品,而像后来的“洛阳纸贵”更说明传抄的普遍;明代的《金瓶梅》尽管卷秩浩繁,其初也是以传抄来传播的。明代末年,印刷技术有了大的发展,大量的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小说和戏剧作品,通过书坊印刷出来,社会上形成了小说“无翼飞,不胫走”的局面,越到后来这种以印刷为传播方式的情况越益普遍,并成为文学传播的最主要方式之一。

(7) 刻石与题壁。古代中国在印刷技术尚未展开时,由于文学作品发表阵地极少,有一些作品便通过刻石或题壁的方式进行传播。前者以李斯的泰山石刻为代表,同时还包括大量的碑刻;后者以苏轼的《题西林壁》为代表。

2.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类型

与上所描述内容相联系,从传播学阐述的传播类型原理角度来考察,还可见出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几种典型的传播类型。

(1)单一传播。此亦可称为自我传播,即是作家个体对作品的创作、加工和欣赏,以及价值肯定。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中占有很大比重。在古代文学史上,因为文学的自觉相对晚,很多作家的文学创作,并非出于广泛传播目的,而是更多的在于自娱和自我欣赏,另外,有些作家在创作之后尽管也说些“留之名山,传之后人”的话,但对于这种遥遥无期的许诺我们是不可轻信的,他们的真实心态还是以自我宣泄为主。

(2)线性传播。亦可称为纵向传播,即是通过口口相传或代代相传的方式,将文学作品流传下去,从而在文学的传播中形成了一条向前的直线。这种情况现在古代小说传播中表现得最突出。一部小说名著的成书过程,往往就形成了一条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传播的直线,人物形象在这条线上越传越丰满、越完美,故事情节在这条线上越传越生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成书都是这一传播类型的例证。

(3)非线性传播。亦可称之为横向传播,即是一篇(部)文学作品在同一时代,得到广泛传播。如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其时“省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徒之口无不道”。苏轼的创作也在当时广为人知。

(4)放射性传播。是由一个以被传播的文学群体所组成的放射原点,向四外扩散传播,其形状有如射线。此种传播类型在文学史上表现颇多,南朝的宫体诗、宋初的西昆体、明初的台阁体、茶陵体都曾作为放射原点而体现过这种放射性传播特征。

3.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思想

无论是传播方式,还是传播类型,它们的出现和形成,就其根本而言,是由一定的传播思想所决定的。从传播学立场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出明确的传播思想,这大体可以

归纳出以下几点。

(1)“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提出的传播思想。儒家在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通过道德修养提升自身思想境界、融个体于集体之中、个人的欲望和价值以群体的价值和欲望为转移的同时,特别主张以“文”作为道德的外现,并与道德一起构成君子形象。认为只有这样,个体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即“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具有文采、文雅之意。儒家不仅要求人格上体现“文”的特征,也还要求人所发表的言论也应该“文”。显然,从传播的角度“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是具有传播思想意义的。

(2)“再次立言”。也是先秦时代出现的一种传播思想,即所谓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到司马迁那里,这一思想被他以实际行动发扬光大——他把忍辱含垢所写《史记》的工作,看成是与比他更早的那些圣贤的立言以传世一样,并郑重强调“立言”是一项不朽的事业。此一思想为后来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家所继承和发扬。

(3)“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最早见于曹丕《典论·论文》。该文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一思想发生以后,对当时和以后的士人影响非常大,其弟曹植就说“骋我径寸翰,流藻重华芬”;以后更出现许多持着“文章可立身”价值观的文学家。

(4)以幻为真。这一传播思想可以上溯到神话传说。神话作为文学源头,它是人们按照自身的认识对自然和社会的幻态反映,可是它又是原始人对于世界的“合理解释”。因之,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幻态即真态,真与幻是浑然一体的。此一思维影响到后来,就使得文学家甚至史家在发表自己的作品时,持着这一思想,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干宝作《搜神记》“以发明神

鬼之不诬”。

(5) 声律传文。中国古代早期诗文的声律大多带有自然特征,到南朝,沈约等人发现了所谓的“前人未睹之秘”的诗歌声律,从此,中国古代的诗文开始了自觉地以声律传播,甚至被强调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的程度。这种思想到唐宋诗词繁荣及以后,更被一些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所发扬,如初唐的“上官体”;宋代周邦彦的创作,以及明代戏剧方面的“吴江派”,清代的“格律说”。这些有关声律的思想和主张对于文学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4. 辅助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要素

站在传播学立场,以传播学基本理论提供的视角考察,还可以见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中有几个辅助性要素,现归纳如下:

(1) 作家人品与政治地位。这是影响先秦至六朝文学传播的最重要的辅助性因素之一。中华民族是个道德至上的民族,故对于人的品格极其看重,甚至是崇尚。为此一文化价值观念所决定,在文学传播中,如果作家的品格高尚,他的作品必将因其人格而获得一定传播,而且传播的范围是与其品格的高度成正比:品格越高尚,其作品也就传播越广。孔子的著述成为经典而千古流传、屈原的《离骚》至今传唱;还有陶渊明的田园诗、杜甫的爱国诗都是这方面的具体例证;与此相近的是作家的政治地位有时也与其作品的传播成正比。古代中国官本位的意识非常浓郁,身居高位的作家之作品有时便因其政治位势而得到较广的传播,另外,有些位势较高的作家往往喜欢罗致文学之士,在其周围形成一定的作家群落,这也有助于其文学的传播。西晋的张华、南朝的徐陵、庾信,还有宋初的杨亿、刘筠、钱惟演,明初的“三杨”都可作为代表。

(2) 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古代中国文学的传播还与作品本身的艺术形象及故事情节有密切的关系。就前者说,作品的艺术形象越鲜明、丰富和生动,越具有深广的文化蕴涵,其被传播的范围就会越大、被传播的时间就越加久远。中国文学史上的灵筠、项羽、刘兰芝、

木兰、诸葛亮、宋江、贾宝玉都是这样的人物形象。易言之,文学形象的美学价值是与其传播范围成正比的。与此相近,作品的故事情节也与本作品传播有密切关系。一部作品如果其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并有深刻的美学、社会学意义,该作品就有可能被广泛传播。文学史上的孟姜女哭长城、木兰从军、七仙女故事、唐僧取经、三国分合等都属此类;反之则不为很多人所知,亦即作品的传播与作品本身的故事情节的美学价值成正比。

(3)统治者喜好。列宁曾经说过,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就是统治的思想。将此观点引申到文学传播上也有其启示意义。古代中国,文学的传播往往与统治者的喜好有很大关系。一种文学题材或形式,如果被统治者所喜欢,则会有较大范围的传播。如南朝的统治者喜欢宫廷艳诗,就有许多文人制造和传唱宫体诗;该类诗就由宫廷走向社会;南宋皇帝喜欢话本,通俗小说在那时的繁荣就与此有关;在元代,杂剧和散曲深得蒙古贵族的喜爱,于是便有杂剧创作和演出上的繁荣。

(4)词采与修辞。文学的传播还与作品的语言和修辞手段有较大的关系。通俗的语言,巧妙的修辞往往是一部作品得以广泛传播的前提。魏晋南北朝时代骈体文的流行在很大的方面就取决于作品的修辞之精美;而《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小说的大范围传播有绝大的方面是取决于小说的通俗化的语言;再如,杜甫诗的流传在很大方面就取决于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言和修辞上的锤炼。

当然,决定和辅助文学传播的因素并不止于上述,这里仅是择要提出。

四

通过以上的概略描述和说明,我们可以见出以下几点与文学传播、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发展有关的特定规律和理论质素,并从中体会到一定的理论启示。首先,音乐在古代文学传播中极具意

义。音乐作为传播文学的方式和手段,曾在古代文学传播中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先秦的“诗三百”、汉代的乐府至到晚清的戏曲都是凭借音乐来完成传播的;第二,格律和修辞在文学传播中亦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南北朝以后,文学上的格律修辞开始由自发转为自觉,当自觉地讲求格律修辞形成为文学思潮后,便对于文学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文本语言对于文学传播也有不可忽略的作用,文学作品语言的通俗与否,关系到文学传播的广度;第四,创作主体在文学传播体现出巨大作用。因为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尚品格、尚社会政治地位的传统,所以作家自身的品格和政治地位在文学传播中具有很大的作用:文学作品传播的广度往往与作家品格和政治地位成正比。第五,作品本身对文学传播也体现出一定的价值作用。在文学传播中,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越高、人物形象越典型、故事情节越生动典型,其传播的范围就越广、传播的时间也就越久远;最后,文学批评和鉴赏对于文学传播也具有很大的价值,凭借着文学鉴赏和批评,许多的文学作品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而文学鉴赏所形成的类似文学沙龙一样的作家群,往往还能造成一个文学传播核心,从而形成放射性的文学传播。

上述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中的规律性表现和理论特征,对于建设文学传播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既可以为文学传播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研究范式,也可检验和丰富传播学基本理论与方法、标志了文学传播学学科的独立存在,同时,站在传播学立场重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可刷新今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

运涛的书可以看作是在这一思考引导下的再创造,是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表现。

运涛是个刚刚离开学校的青年,从一般的观点看,他好像更应该流连于学术门外,更应该厚积薄发,但运涛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汲汲以求,连续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在我刚刚落脚沈阳之后,他的学术

文章就连篇而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和让人肃然起敬的青年。我在为他取得这样学术成绩欣慰的同时,也极愿意把他推向学界。尽管他还非常年轻,尽管他的某些观点、意见和论述表达还比较稚嫩,但他有热情,有勇气把自己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面的思考公之于众。这就是很好的事情,就值得鼓励和激扬。我甚至在这里看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希望和将来。因为《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有上述可读之处,我便诚恳而热心地把它介绍给学界的朋友,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更多的还是凭读者自己去判断。我与作者一起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曹 萌

2004年11月于沈阳师范大学

自序

运涛

学术的殿堂神圣而深邃,我执着地以为,在那一个又一个的十字路口,应该更容易找到我的学术之路。于是,我先后把目光投向了贬谪文学与心理学的十字路口、经典文学与传播学的十字路口。懵懂间,我觉得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将为古代文学研究打开一道神奇的门。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过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它们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贬谪文化中的诗文,经典文学中的小说,都经过了长期的孕育,前者可以从屈原算起,后者的源头则可追溯至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唐宋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古代小说已达到成熟的阶段,至元、明、清,小说终于绽放出奇花异葩,占据了中国文坛的主流。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也不可不读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中的诗文,经典文学中的小说。

中国古代贬官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中国古代贬官文化以古代贬官士人的政治悲剧为重心,广泛涉及社会政治、军事、哲学、宗教等一系列文化现象,还有更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探讨。目前